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3.0003

# 略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升华与国家建构之关联

李鸿宾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中国自从脱离帝制走上共和道路后,就面临着如何调整好民族群体与国家对应的问题。中国历史悠久、族群众多,且关系复杂交织,使得这种调整的难度远超一般性国家的常规建设,但终以“多民族统一国家”而塑形,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即其高度的理论概括。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再强化,乃是国家建设内在诉求与因应世界局势发展的合力所为。以民族群体之间的“共通性”为追求目标进而达到“共同”之境界,促使国家进入文明的高度发展,应当是二者对应关系中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积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强调民族群体共通性的一种思想理念。民族群体之所以能汇聚,就在于群体中内存的共同性(或共通性),但它却以“差异性”为前提。<sup>①</sup>就当下的中国现实而言,它尤其关注确定下来的56个民族彼此共处的思想意识及其形塑的整体观念,突出的特点就是整合性诉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整的表述,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的,<sup>②</sup>这意味着共同体意识已成为当下中国族群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奋进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强调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sup>③</sup>为什么会有这种“意识”的升华和强化呢?它的意涵何在?这是本文试图要解释的问题。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依托

如上所言,“意识”是人的理念,属于精神思维活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这个族群群体的思维活动,它立足于“人们共同体”这一维度,这是我们必须明确的前提。然而我们称之为“民族”这类群体,在现今的世界中都与“国家”政治体连在一起,倘若缺少“国家”这种介质,民族群体便无从着落。事实上,人类文明的演进历史就是在“国家”“政权”组织框架下实现的。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

收稿日期:2022-10-28

基本项目:本文系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项目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鸿宾,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史、中国中古民族关系史。

① 参见郝时远:《在差异中求和谐、求统一的思考——以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和谐为例》,《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6期。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2020年10月27日。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2022年10月26日。

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sup>①</sup>这表明，人类群体的过渡伴随着部落向国家组织的演进，进而脱离了野蛮时代。国家的出场乃是阶级对立的促成，阶级对立则是社会分层之结果，分层又建基于社会分工，这些均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和协调的反映。说到底，国家的实质就是调整人群关系，人群的聚集及其互动构成了社会，“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sup>②</sup>到了近代社会，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密切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注定是连在一起的；哪一个没有对方都是不完整的”。<sup>③</sup>人群(共同体)与国家的关系既已明了，这里要解释的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出现，究竟有什么现实考量？

习近平总书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是这样表述的：“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sup>④</sup>这就是说“共同体意识”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她的政策与国家合为一体，最终落实在国家的行动之中。换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升华与中国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对应，这才是民族群体意识强化的基本动因。

就中国的现实而言，自从20世纪90年代美苏对峙的二极格局解体之后，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障碍。它表明经济建设带动社会财富和物质的增加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导趋势。在此形势下，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她的能量获得空前的释放，以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快速的发展跻身世界前列，尤其世界第二位的经济体量使得其后续发展的劲头大增。这一切均证明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关系密切，从中国自身角度考量则叫作获益于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虽然表现在方方面面，但不同时期都有其特定和具体指向；反过来说，当中国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连为一体之时，世界各国如何因应并与中国打交道，也有他们各自的考虑和需求。正是出自多维角度的交往互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开始日趋密切，40年来中国的发展与迅速崛起，证明交往的重要与不可或缺。

然而经济贸易的一体化趋势也对民族国家的格局造成冲击。不论以农业和制造业为标志的实体经济还是以金融、信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其发展均以质量和规模为主导且不以特定地区为限制，全球化走向与现存国家框限之张力遽尔凸显，不同文化塑造的人群差异亦从隐性转为显性，龃龉和矛盾随之上升，表现在国家层面则是对包括主权在内的利益造成冲击，民族国家的诉求被弱化。事实上，中国应是这一波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但她同样面临上述问题，在这种趋势中，民族共同体与国家关系的协调，就成为中国面对并亟须解决的紧迫问题。上面事实表明，中华民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密切结合是中国作为国家主体得以发展的一条必备之路，然而作为全球的一员，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sup>⑤</sup>这意味着中国既要完成自身民族国家的建构，也要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和壮大，进而为世界文明做贡献。如何协调二者的复杂关系，就成为当下中国的重大要务。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依托。

①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②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6页。

③ 参见[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2017年10月27日。

⑤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求是》，2021年第1期。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承接

如上所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思想和观念，它的强化基于现实之需，但作为理念自身，它亦有一个继承和发展的内在理路。其继承的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理论是费孝通先生于198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演中首次提出，他从历史视角出发，着眼中华民族的各层次构成及其相互关系，揭示出这个兴衰分合、彼此共处、个性而多元的统一体从“自在”到“自觉”的衍化进程，呈现出汉民族凝聚之核心、各民族经济类型之多样、各种语言之并存、融合条件之复杂、民族多元结构与一体进程之递进等诸多特点。<sup>①</sup>该文发表后，费先生以此为基调并与其他学者的论文合成一部著作，又通过召开各种学术会议等方式，遂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阐述的主体看法。<sup>②</sup>论文最核心的思想，按照费先生的解释，就在于“中华民族整体”的观察，<sup>③</sup>它强调的是中华民族包含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实体，且各有不同的认同，然而他们也有一个从分散的多元向一体结合的过程，“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同属一个层次，他们互相结合而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体，是高一层认同的民族实体”。<sup>④</sup>具体民族的实体与中华民族的整体，是费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核心贡献。那我们如何理解这个创新呢？

就费先生自身而言，这是他20世纪30年代接触民族问题并开展社会实践直至20世纪80年代再度聚焦这一问题前后认识的理论升华，<sup>⑤</sup>然而费先生的一生恰与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道路相伴随，所以费先生的个人思考也是那个时代国人普遍性思考的反映。<sup>⑥</sup>这个思考的出发点就是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与国家如何转向以及转向中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它成为中国建设与发展的主旨动向，<sup>⑦</sup>也是人类社会走向新阶段的必然诉求。1648年，欧洲各国经过30年战争的磨难，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形成了国家建设的新模式。<sup>⑧</sup>它以调动大规模军队，聚合农村人口、资本势力和商业化经济为一体的优势，在日趋频繁的商业、军事和外交的争衡交织中，将国家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进而取代了城邦国家、帝国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体。<sup>⑨</sup>与此前任何政治体不同的是，这种模式将特定的民族群体与特定的国家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使国家这种政治体发挥出最大的效能以获得最大的效益。这种模式历经随后的不断衍化而形塑了基本特性：民众以公民的身份成为国家主人，其权利与义务受宪法承认并赋予行使的职责；国家以保护公民为要务，建立的政权依托特定的地域而存在；国家之间通过契约的订立和遵守，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并由国际公法和组织认可。这就将民族（公民）、国家、地域这三者密切地联为一体，<sup>⑩</sup>其能量高度浓缩，一旦加以释放，效率之大可想而知。<sup>⑪</sup>

① 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6页。

② 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第49页。

④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第11页。

⑤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第1-14、47-50页。

⑥ 参见马戎：《费孝通先生的民族问题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

⑦ 参见陈建樾：《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近代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解决方案之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励轩：《超越民族国家：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国家建设》，《思想战线》，2022年第4期。

⑧ 参见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91页。

⑨ 参见[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4页。

⑩ 参见[西]胡安·诺格著，徐鹤林、朱伦译：《民族主义与领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5页。

⑪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王铭铭校：《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0-147页。

清朝解体之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建立政权，族群问题如何解决？成为 20 世纪初期国人的重大任务，孙中山等人以共和制方式立国，就是民族国家这种模式于中国的再现。但建立民族国家就意味着要化解王朝遗留的各种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各民族如何与共和制政权的建设相适应。从革命党、保皇派的争论到“五族共和”，从“宗族论”再到抗战蜂起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族群、国家及其交互关系的激烈辩论，伴随着社会转变的现实，构成了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的主旋律。<sup>①</sup> 1949 年以后的数十年间，中国关注少数民族的确认和界定，通过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以宪法颁布的民族平等、区域自治等制度性的建设，使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层面达到与汉族共同发展和提高的目标。由此可见，20 世纪中国的历程，就是将众多的民族在什么层次和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和手段整合在一个主权国家之内。因情况复杂多变，每个时代的倾向和特点各有不同，国家在整合过程中颁布的方针和政策也多有侧重，但无论怎么做，其基本走势即中华民族与中国国家密切对应的方向始终如一，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就是基于这种历史变迁做出的概括。时至今日，民族共同体的演进与国家的对应又迈向了新的阶段，“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体”及其蕴含的“共同性”成为时代的新诉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顺势而生，所以它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继承和直接衍化。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关联的历史基础

从上面简短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虽属民族群体的思维和意识即“民族共同体”的范畴，<sup>②</sup> 但民族群体与国家政治体不可分离即一体两面的构成使得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时，就必须将其纳入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正如前文所说，这种模式的核心主旨就是对民族与国家进行有效协调，这已成为世界各个政治体发展的基本规范。就中国而言，56 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与共和国的协调和因应，是中国建设的要务，其中 55 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的协调和处理又成为融洽构建的关键。中国众多民族与国家契合之复杂超出民族国家通常的规范，近代以来中国逐步塑造出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模式。<sup>③</sup> 无论如何，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成分，势必与这个整体发生关联，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与国家政治体合二而一的结构所致。那么，中华民族与国家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联呢？

我们先以美国为例加以对比。美国延续和承传的基本精神是 1776 年独立以后颁布的宪法及其施行的法律规章，浸透的则是基督教新教的信仰，这构成了美国的建国之路和发展之本。人为性的主动创造，是美国建国的基本特质，<sup>④</sup> “历史”与它似乎没有天然的联系，其合法性建构亦不依赖于此。但中国的情况恰恰与此有别。“悠久的历史”既是中国发展的资源，也是其合法地位确立与稳固

<sup>①</sup> 参见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2 - 119 页；高翠莲：《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8 - 55 页。

<sup>②</sup> “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自觉意识，萌生于清末民初那个转折时代。20 世纪后半期的讨论，应以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概括为成型，大致表现在 50 多个民族实体（其中较大者属内又有若干支系）和中华民族整体等层次的构成方面。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第 17 页。另参见许纪霖：《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何时形成》，《文史哲》，2013 年第 3 期；郑大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 - 8 页。

<sup>③</sup> 这已成为学界的主流话语，代表性的观点可参见白寿彝《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1 - 18 页）一文。将其贯通全书加以叙述的比较典型的著作，可参见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一书，尤其第 147 - 148 页。

<sup>④</sup> 譬如在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看来，构成美国特性的主要是盎格鲁 - 新教文化和“美国信念”这两个要素。参见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33 - 115 页。

的保障。我们知道，历史上最早走向国家建设道路的是西亚北非地区的苏美尔、古埃及这些王朝。<sup>①</sup>随后，欧亚大陆相继出现了众多的王国和政权，前后数千年。这些王朝都在特定地区特定时代呈现着兴衰无常的轮替，有的延续千年之久如罗马帝国，但更多的则是昙花一现或瞬息万变。与这些王朝相比，中国政权出现得虽不算最早，每个存续的时间也有限度，但凝聚王朝的制度建设、管理模式，尤其是内存的思想意识这些要素，并没有因统治集团的更新换代而被废弃，也就是说它的脉络“前后沿承”，这构成了中国文明的基本特质。之所以如此，固然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但不同人群以王朝政治体的轮替为承载，通过交往、互动、融合、壮大而凝聚，无疑是最根本的原因。换言之，从夏朝以来，中国的国家建设与人群的对应就成为基本导向，夏及其后的商、周国家形态是以天子为首的朝廷固据在都城，采用诸侯统辖的“封建制”予以协调，这种建构是在继承此前部落联盟和酋邦体系基础上的升华和超越。秦汉一统化的王朝则是在封建制之上塑造而成的幅员辽阔、族群众多、规模庞大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权模式。为了有效治理，君权决策、相权辅佐、中央地方官制配套的行政管辖，成为笼络和凝聚的重要手段，以协调中央、地方和社会三者之关系。<sup>②</sup>这种王朝的建构就是通过将汉系族群与非汉系（又称“胡系”）人群强有力地整合而达成，发挥整合作用的是由皇帝及其官员构成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及其掌控能力是促进中国王朝转合的重要因素，并以此著称于古代世界。<sup>③</sup>

如果说秦汉王朝协调多族群集于一个政权运作的话，那么随后呈分裂状态的魏晋南北朝，则是一统化王朝解体、众多族群尤其周边四夷的非汉系族群发展壮大并走向政权建设的新时代。从汉末各种势力交相碰撞崛起的魏、蜀、吴三国，到西晋的短暂统一，表明汉式政权的再度聚合；然而这种局面又被北方刘渊、石勒建立的汉、赵政权所打破，随之出现了20多个分布各地且前后相继的区域性政权，是为“十六国”；从草原南下的北魏又将黄河流域统合起来，与南朝并峙形成了两个更大的区域性王朝。它的重要意义就展现在中原一统化王朝作为经验而被周边所吸纳，为周边四夷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当然这些并非都是彼此相处时的温文尔雅，而是伴随着激烈的斗争甚至流血战争，这也正是人类社会复杂性的体现。这一时期众多族群相继崛起建立政权，立稳脚跟后壮大，为达到这一目标，中原场域就成为他们争胜的关键，以中原向四方的布局遂成为各路诸侯奋进的指向。最终由杨坚的隋朝将这些散碎的政权重新统合为一，跨越长城南北、兼有农耕草原的复合型超越式兴盛格局的唐朝，就是依此而底定：正是基础雄厚、融合四方，才有唐朝盛世的展现。

上述情况表明，王朝的兴衰变迁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决定其变化的则是具有支配权的人群互动。东汉的解体，除了为中原本土的汉系势力提供重新洗牌的机会之外，也为周边那些具有政治抱负的非汉系（胡系）势力走向政权化的建设开辟了新道路。以匈奴、鲜卑、羯、氐、羌所谓“五胡”为标识的诸多势力，正是借助这个机缘迅速崛起并以构建政权而驰骋中原内外。欧亚大陆东缘黄河长江这片广阔的农耕地带即广义的“中原”，之所以成为各个势力角逐的中心场域，盖系这里才能为他们确立合法性地位提供道义之缘由。这些胡汉势力相互碰撞、交往，终由隋唐王朝之形塑而转合为一，也是匈奴、鲜卑这些一度雄强的势力不再见诸历史的基本缘由。这表明，胡汉各系势力建构自己或与他族联合的政权，以相互争衡、彼此兼纳追寻合法性地位的目标，就是以中原为核心的一

<sup>①</sup> 参见[英]塞缪尔·E.芬纳著，王震、马百亮译：《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217页。

<sup>②</sup> 参见曹正汉：《中央、地方与社会：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sup>③</sup> 参见[英]塞缪尔·E.芬纳著，王震、马百亮译：《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修订版），第474-554页；[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145页。

统化王朝局面的再现，这成为那个时代族群互动与王朝因应二者关系的终极性诉求。<sup>①</sup>

辽、宋、西夏、金的并峙，是唐朝解体后五代十国割据局面再度整合的结果。它从更为广阔的视角证明周边胡系力量的扩展达到新高度时代的到来。若与魏晋南北朝对照，五胡十六国至多是影响力尚有未逮的区域性割据，辽、金的北系政权则挺向了中原，展现出拓展全国的意向。亚洲东部中原汉系周边各族势力政治视野与抱负之兴并以王朝建构而呈现，成为这一时代的突出特点。<sup>②</sup> 这股潮流最终引发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势力兴起于草原。他们相继攻灭西夏、金朝等势力，挥师欧亚，以疾驰迅猛的势头将旧大陆的重要地区囊括麾下，构建了跨区域的数个王朝，横亘亚洲东部的就是这个元朝，它既是蒙古世界性帝国之本，又是中原王朝之承继。<sup>③</sup> 它存续虽不足百年，但却为中华各族汇聚大型王朝之内纵横捭阖的链接提供了施展的机缘，也为明清两朝的再度崛起奠定了基础。

清朝是继明朝之后建构的融合众多族群的超大型王朝。明朝推翻蒙元统治，原本打算乘胜进军统辖草原，但终受到限制而遗憾返回。蒙古草原、西域腹地、青藏乃至云贵高原与东南的台湾等地，在康雍乾诸股文攻武卫的努力下再度将其拢置于王朝的框架之内，源自东北的满族(洲)贵族集团开创的大业历经百数十年的拼搏，至19世纪前期，终将中华各系族群与中原内外广袤地区整合为一，臻至于古典王朝的峰巅，并以盘踞欧亚之东缘著称于世。<sup>④</sup>

在这4000多年中国前后的发展演变之中，族群与王朝相互协调、分合相间乃至荣辱共进，二者之关联不仅贯穿其间，亦成为衍化的主旨线索。迨至19世纪中叶，在西方势力的冲击下，中国经由清朝灭亡、民国模式的转换，遂从王朝国家进入民族国家，王朝辖属的多民族多族群在共和政体之内如何按照新型国家的方式塑造，成为20世纪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上文述及的中华民族与国家之关系的密切对应在新时代下如何升华到新层次，就成为21世纪的新诉求。历史的悠久既赋予民族关系之繁复与多变，又为这种关系之升华释放出合法性的依凭和理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强化若舍此而求诸其他，无异于缘木求鱼。

####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关联的现实意涵

上述史实表明，古典中国的王朝国家与胡汉诸多族群体的相互关系及其拓展，为现代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相互适应的新构建，提供了丰富无比且可利用的资源与财富。“历史”既是中华民族与国家同步发展衍化的源头，又为二者步入新时代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历史的悠久既赋予民族关系之繁复与多变，又为这种关系之升华展现出更多的可能选择；“历史”本身不独为中国所享有，但前后贯通的“一致性”却为中国所著称。虽然古今政体存在性质差别，但历史上民族关系中的那种共存、促进和相融，尤其表现出与政治体聚合的正向能量，并不因此而丧失其功能。中国现代民族与国家对应的道路就建立在这悠久的历史之上。正如前文所言，民族与国家的密切结合产生于欧洲特定的场所但却传遍了世界，其动因就在于国家的能量发挥“极致”，并取代了以往的任何政治体。19世

<sup>①</sup> 秦汉隋唐前后的衍化，不仅塑造了中华自身的王朝范式且臻至成熟，而且对欧亚大陆东部地带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方面的讨论成果亦多，但前后贯通且聚焦东亚整体性的思考，私见当以美国学者何肯(Charles Holcombe)所撰《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魏美强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较为突出。

<sup>②</sup> 参见[日]堀敏一著，韩昇编，韩昇、刘建英译：《隋唐帝国与东亚》，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sup>③</sup> 有关蒙古帝国及其元朝的角色与地位，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多有讨论，其书汉译者亦多见。中国学界就此展开具有反思意义的讨论应以数年前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组织的会议为代表，其成果汇集在张志强主编的《重新讲述蒙元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一书中。

<sup>④</sup> 有关中国王朝的发展及其特质，一直是中外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其中“统一与分裂”成为惯常的叙述并成为主流话语(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近年值得留意的新思考应以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较为突出，作者从国家结构与天下结构二者结合的角度，提出“旋涡”的演进模式，详见该书第19-50页。

纪40年代中国在这种模式的冲击下便走上了传统延承与新式转轨的博弈之中,历经海外新说的阐扬、洋务运动的践行、戊戌维新的开展乃至清末新政的尝试,以及随之而来的民国构建、抗战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发展等前后百数十年的变迁嬗替,中华民族族群之间的关系、民族共同体与国家之对应这两种层面的契合,<sup>①</sup>在共和制政治体的道路上不断地增进和强化,其趋势之明显,不言而喻。但正如印度被视作一个文明体那样,<sup>②</sup>中国自身族群众多、文化多样和容量之大,亦非以一个具体特定的“民族国家”所能承载,<sup>③</sup>所以中国从王朝向共和制转轨之中充满着各种矛盾、博弈,在协调和共进实践的基础上,费孝通先生总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既揭示出中国民族实体的多样和长期衍化的事实,又将这些纷呈歧变中的共通性予以展露并以“多元”内存的“一体”视作历史发展的方向。应当说,这是走向“自觉”进程的20世纪中国民族基本动向的真实写照,这个“自觉”又经数千年“自在”的累积而升成。<sup>④</sup>

我们今天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当说就是对“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各民族“共通性”的追求,这种“共通性”表明的是民族之间复杂关系可彼此相通的那个或那些层面,进而达到“共同”之目标。<sup>⑤</sup>这也正是我们将“共同体意识”视作“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承接的根由。如前文所言,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思想和思维活动,强化“共通性”也就是强化与国家发展相适应的群体性“认同”。所谓“认同”,是区别于其他群体(或个体)的自我判断。民族国家之所以具有能量,盖取决于群体认同与国家直接对应,它之所以能超越历史的惯性继续存在,亦在于“领土范围内的民族和人民坚持了保护性的共同体主义”。<sup>⑥</sup>亨廷顿出版《我们是谁?》的本意,就是鉴于他那个时代(包括当下)美国遭受的内外冲击,他力图以美国建国的基本轨则及其精神作为拯救的手段以凝聚人心,所谓“美国信念”及其特性,无非是擢升美国人的精神理念,<sup>⑦</sup>这同样是强化“认同”的力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筑牢正是这个群体“认同”的加强,它的目标就在于多民族国家的建设,如同学者所言,多民族国家的整合既包含制度性建设,又包含社会心理的适应。<sup>⑧</sup>作为群体的构成,人们的精神和心理要素决定着人们的外在行为,更影响他们与国家政治体的关联,所以心理是内在的、核心的因素。这才是我们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

## 结 语

本文简要论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增进56个民族关系的必要性,它的重要意义就表现为中华民族如何在新的层面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有效的适应。揆诸过往,民族作为共同体本属人群之聚合,国家则是权力的构造,例属物化之“机器”,<sup>⑨</sup>本不相关的二者却伴随着人类的命运结成了“一体两面”的关联。倘若离开了国家,人群的组合就不能迈向高度的文明进程;脱离了人群,

① 从现代性转轨这一角度分析中国历史演进的著作,可参见[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03-122页;汪晖:《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重印本前言),《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 第一部 理与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1-102页。

② 参见陈光兴:《序:作为方法的印度》,张颂仁等主编:《杜赞奇读本》,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③ 较早将中国视为一个超国家文明体的,可参见1949年梁漱溟著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166页);当下持此论的亦不乏人,较著者有赵汀阳的《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秉持这种思路者,均将现代中国与古代王朝作前后连续性思考,并强调现代中国的“历史特性”。

④ 参见马戎:《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结构及演变》,《思想战线》,2019年第2期。

⑤ 参见马戎:《习近平同志近期讲话指引我国民族工作的方向》,《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⑥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曹荣湘译:《认同的力量》(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页。

⑦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⑧ 参见周平:《多民族国家国家整合的逻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⑨ 参见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第251-252页。

国家也就无从谈起。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人群与国家互动与发展的衍化史。<sup>①</sup>就中国的案例讲，与古典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政体的“分散化”相对应的，不论是春秋战国争衡衍生的秦汉，还是魏晋南北朝催成的隋唐，乃至辽宋西夏金之后的元和后来清的塑造，古典王朝走向的“一体化”之分明，足以促成学界视中国结构性整体为其追求之特质；<sup>②</sup>这种特性又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催生下，中国以往的民族与国家的“自在”性联动变成了“自觉”性的打造，终以中华民族与共和制国家的新契合而成型。当今形势下我们所强调的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及其升华，就是将民族关系中内存的共同性那个层面进一步开扩，进而达到凝聚的新高度，这种凝聚的民族共同体又与国家的发展获得与新形势相匹配的契合。这既是中国自身历史与现实衔接的逻辑诉求，又是全球互动局势影响之所致，这二者看似两个不同的场域，却都构成了促使民族国家这种政治体数百年来盛行于世且继续前行的动因。所以如何加强民族与国家的密切结合，并使之相互促进以冀望一体化的发展，就成为我们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根由所在。

责任编辑：孙久龙

## A Research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ublimation of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Nation Building

LI Hong-b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For China,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thnic groups and the state became an important issue since it had chosen the republican road instead of imperial mode. China's long history and complex multi-ethnic relationships made this adjustment much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convent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average country. However,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was formed eventually, which had been summarized theoretically as “the pattern of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by Fei Xiaotong (费孝通). Nowadays, the re-strengthening of the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results from the joint effort of the internal demand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the respons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situation. It should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to pursue the goal of “commonality” among ethnic groups,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highly civilized country.

**Key words:**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sup>①</sup> 我们看到的古今中外，人群的活动均依托社会组织而行，迈进“文明”之后，展现的就是各个族群通过王朝国家这类高级社会组织而活动，它也成为文明进程的核心要旨。

<sup>②</sup> 专注于中西国家道路不同取向的新近研究成果，可参见[美]许田波著，徐进译：《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赵鼎新：《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4-91页。